

《新中华报》：“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

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刊号延续《红色中华》为第325期,五日一刊,承担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的职责,至1938年12月25日,共出版146期。

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进行改版并以“刷新第1号”复刊,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四开四版,使用“中华民国”纪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至1941年5月15日,共出230号。次日,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

在艰苦环境中编辑出版

《新中华报》先后由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管理,用纸是延安振华造纸厂生产的马兰纸,印刷所用油墨来自延安石油厂油矿的废渣油燃烧提取出的烟灰,并由中央印刷厂承印,最高生产量“每月约排一百九十万字,到一九四一年秋,已提高到每月排三百万字,印张三百二十令”。发行工作先后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收发科、光华书店、新华书店负责,发行范围覆盖陕甘宁边区23个县与各敌后根据地以及部分国统区、敌伪区,在海外一些地区也能看到《新中华报》的身影。

《新中华报》的编辑部最初设在延安南门外西山上的三孔窑洞里,1939年改版后的几期时间内,该报的编辑是在清凉山上一孔大石窟内完成。随后,编辑部迁至杨家岭,1941年5月,再次迁回清凉山。初始时,编辑只有向仲华一人,既是《新中华报》社社长,也是该报编辑,“还要自己校对,早先得兼管发行名单……遇到警报,他把稿子往皮包里一放,爬上山头躲警报,坐在地上编稿子”,至1937年9月,该报改为铅印时才调来一个助手——左漠野,初期的《新中华报》便在此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编辑出版,成为传播国内外重要消息的号角。

之后,编辑人员增至四五人,有向仲华、秦美、柳风、柳毅、辛平,后陆续又从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陕北公学等处调进10多名工作人员,充实了该报的编采力量。艾思奇、柯仲平主编副刊,徐行白、沙可夫、白苓、唐起、黄药眠、徐懋庸、高敏夫等都曾为副刊写稿;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过题词、讲话和文章。

改版后的《新中华报》先后由李初梨、曹若茗担任主编。郁文、王辑、张映吾、叶澜、于敏、刘力夫、吴一璽等为该报编写人员。主要撰稿人有毛泽东、王明、任弼时、王稼祥、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高岗、朱德、陈伯达、寒冰、周扬、丁玲、胡考等,荟萃了中央领导层、延安学术界、教育界、艺术界等多个领域的优秀人才。

红色宝库 奋斗百年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一曲豪迈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展现出我国石油工人为祖国、为人民拼搏、奉献的奋斗精神和崇高品格。

头盔闪耀“铁人精神”

在黑龙江省大庆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内,保存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一顶铝盔。它是20世纪60年代石油工人王进喜上井工作时戴过的安全帽。

饱经沧桑却完好如初,布满斑痕仍坚不可摧,如今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柜中的银白色铝盔,在灯光映射下如铁人精神般,依然闪耀着熠熠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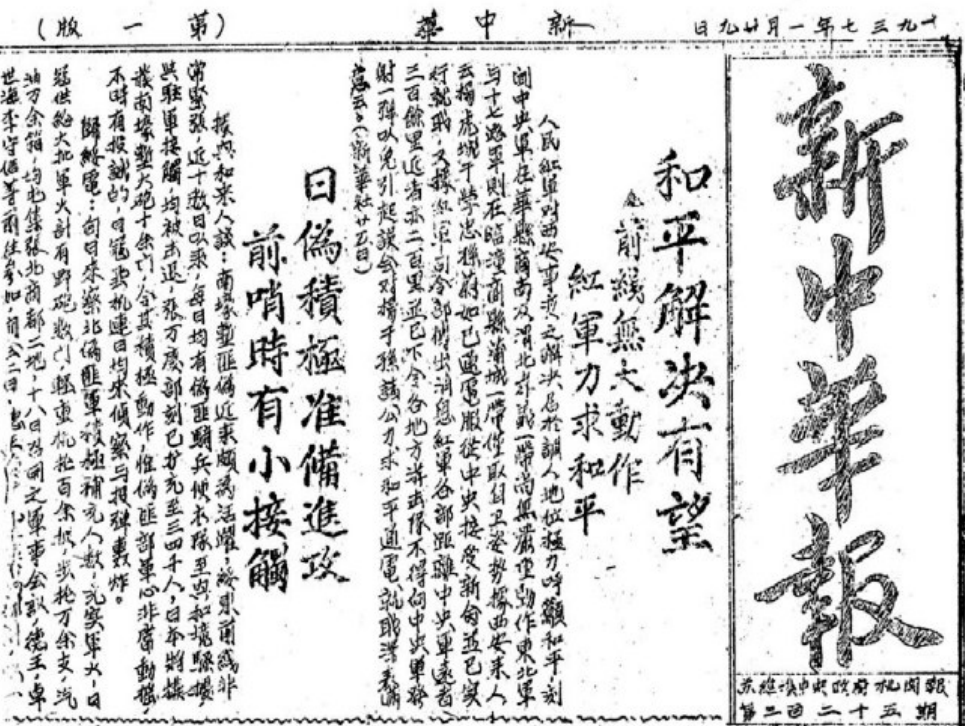
1923年10月生于甘肃玉门的王进喜,1950年通过玉门油矿招工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1956年,王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他带队创造了月进尺5009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所在钻井队被誉为“钢铁钻井队”。

新中国成立初期,石油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在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时,王进喜看到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倍感压力和责任。“国家都没有油用了,石油工人还有什么资格受表扬?”他说。

1960年,在党中央号召下,4万多名转业官兵、石油工人、科技工作者等,在中国东北打响了战天斗地的大庆石油会战。王进喜也率队奔赴莽莽荒原。

在那场气吞山河的石油会战中,王进喜和老一代石油工人正是戴着这样的铝盔,以“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的豪迈气概,成功开发建设了世界级大油田。王进喜也赢得了“铁人”的称誉,成为工人楷模。

在那个物资有限、条件艰苦的岁月,“铁人”的安全帽还被当作饭碗、水盆,甚至被用于运水打井。



“社论”“短评”,以及“国际新闻”“抗日消息”“前线抗战捷报”“要闻简报”“战局一览”“五日国际”“五日常事鲜剖”,主要内容有反映日军侵华和日本国内动态,介绍抗日战争战况,报道国共两党军队抗战战绩,分析国际政治、战争形势。

第二版载有“日本政潮”“最后消息”“战地速写”“战地通讯”“老实话”“五日延安”“边区短讯”“小评”“来件”等栏目,该版内容较杂,分类不定,有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也有对边区民众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反映。

“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

目设置相对固定。

《新中华报》的中缝,内容丰富。物价变动、卫生科普、代购代邮、寻人访问、失物招领、离婚声明、鸣谢启事、遗失声明等均时常刊发。此外,售书售物、餐饮住宿、储蓄收购、金融借贷等广告也可在中缝找到踪影。这不仅便利了边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使该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另外,《新中华报》每个版面的两侧皆刊有标语口号,以呼应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开展的中心工作。为推广新文字运动,该报的报头既有汉字书写的“新中华报”,也写有新文字“Sin ZhungXua Bao”,表明该报对新文字身体力行,也吸引了新文字学习者对报纸的兴趣。

毛泽东评价《新中华报》为“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新中华报》的“好”不仅体现在内容上紧随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

渔船也能打兵舰

张友伦 口述 刘 鑫 魏永哲 整理

从军37年,历经大大小小的战斗数十场,其中不乏苦仗恶仗,印象最深的是1950年解放“披山岛”的战斗,至今每每想起,仍感热血沸腾、豪情满怀。

那年我刚刚19岁,我们炮兵团年初刚刚参加了舟山战役,在浙江黄岩县短暂休整后,我所在的四连和六连奉命配合186团解放大陈岛。

大陈岛地处台海对峙前沿,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敌军派重兵驻守,多个军舰在岛屿周围昼夜巡逻。当时我军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我们连只有6门山炮,6艘渔船,但是山炮在渔船上根本无法射击。战友们的千方百计将山炮固定在渔船上,考虑到渔船随海水波浪起伏会降低山炮射击精度,我们每天在海边训练,研究潮汐规律、摸索射击方法、探索最佳发射时机。当时条件很苦,我们时常饥一顿饱一顿,再加上正值酷暑,顶着大太阳训练,很多人都出现脱水现象,但令我震撼的是,当时所有病倒的战友稍作休息,恢复意识后立刻返回训练,大家心里都始终卯足了一股劲儿,就是一鼓作气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

经过一段时间的临战训练准备后,我们奉命从海门出发,到琅机山待命。一天,巡察的战士们抓住了一个特务,经再三说服教育,他告知我们岛两边分别有条海沟,水流很急,以我们的装备条件很难登岛。我们还得知,大陈岛不远处还有一个名为披山岛的小岛,那里仅有国民党驻军数百人。综合分析后,首长下令利用拂晓前敌守军疲困之际偷袭夺占披山岛,随后再伺机攻占大陈岛。行动当晚,我们趁夜色乘船逼近披山岛,敌巡逻军舰发现后疯狂向我们射击,我们充分发挥渔船体型小、反应灵活的特点,一面组织大部队迅速还击,吸引敌军注意力,一面派出一路小分队乘渔船绕至敌军舰后侧,开炮将其击沉,而后一鼓作气攻下了披山岛。后来在我们休整吃饭的时候,驻防在大陈岛的敌军主力又乘两艘军舰利用其装备优势向我们攻击,我们在海湾口利用地形优势,一次次用6门山炮将敌人的铁甲船击退,让具有优势装备的敌军不得不灰溜溜地撤退。

虽说受当时国际国内多种原因影响,我军从大陈岛撤兵了,直至1955年才正式解放了大陈岛。但当时那段经历却时刻萦绕在我心头:当年之所以能够饿着肚子,用渔船加山炮击溃敌军的军舰,得益于那股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更得益于我们对党的绝对忠诚,只要党一声令下,哪怕立刻付出生命也绝不皱一下眉头。这种精神是我们党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敌人的力量源泉。

如今,我们的人民军队已经屹立于世界强军之林,只要始终秉持、传承发扬渔船打军舰的那股子精气神,就一定能实现强军梦、强国梦。

张友伦，汉族，山东省禹城县人。1931年1月出生，1947年3月入伍，1948年6月入党，1984年3月退役。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等职，随队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作战，荣立三等功7次。

无线电是怎样进入中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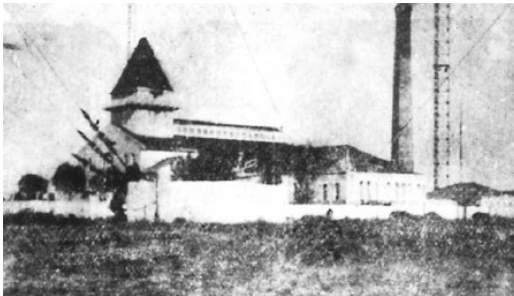
断,难以保证通信联络,这使各方对无线电通信极为关注。

北洋政府时期,交通部、海军部、陆军部各自为政,都抢着与外国订立修建无线电台借款合同。1912年,交通部向德国订购火花式电台5部,分别装在张家口、吴淞、广州、武昌、福州。1918年,陆军部与英国马可尼无线电公司订立军用无线电借款合同,借款60万英镑。同年,交通部也向该公司借款17万英镑,购买25千瓦弧光式长波电台3部,分别安装在兰州、乌鲁木齐、喀什噶尔。海军部也不甘落后,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借款合同,建立北京双桥无线电台。

早在19世纪80年代,丹麦大北、英国大东两家公司通过海底水线已经垄断了中国的国际通信,日本一直无从插手中国通信,早已蠢蠢欲动。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双桥无线电台。在交通部、陆军部与外商借款建设电台忙得不亦乐乎之际,日本从海军部打开突破口。日本凭借自己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高频电台制造技术,急于在中国建立用于国际通信的无线电台,既可推销自己的产品,又可加入垄断中国国际通信的行列,遂与海军部一拍即合,拟定在北京东郊双桥建立一个用于国际通信的大型电台,功率为500千瓦,可以直接与日、美、欧洲等地通报。

1918年2月,由当时的海军部长刘传绶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借款合同,借款总额53.62万英镑。合同特别规定,30年内日本在中国有无线电国际通信的独占权,其他国家甚至中国政府也无权在中国开设国际通信电台,而且如果中国对双桥电台经营不善造成亏损,不能以电台盈利偿还借款时,可由日本接管经营。按此合同,中国的无线电通信简直成了日本的天下!双桥电台于1920年开工,但建设质量不佳,与合同约定不符,海军部拒不接受,一再返工,一直拖到1923年才正式竣工。

三井洋行的贷款条件过于苛刻,引起交通部的极大不满,而且国际通信本来就是交通部的职责,海军部又有什么权力代表政府大包大



海军部与日本三井洋行借款建成的双桥电台。

揽把国际通信主权交给日本呢?同时所谓日本的独占权,也引起英国、丹麦、美国等的强烈不满。

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双桥电台完工前,交通部于1921年1月,又与美国加州合众无线电报电话公司订立了中美无线电借款合同,借款462万美元,在上海设1000千瓦弧光无线电台一座,与世界各大国无线电台直接通信;在哈尔滨、北京、广州、汉口四地各设600千瓦电台,均可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旧金山直接通信。这简直是对日本“独占权”的公然挑衅,日本反应迅速,几天后就向中国提出抗议。接着英国也提出抗议,借口中国违反了1918年与英国马可尼无线电公司合同中规定的优先购买该公司无线电设备的条款。同时,丹麦公使也应声而出,认为中美合同与中国“许与丹麦大北公司及大东公司之特权,大相违反”。

一时沸沸扬扬,对此穷于应付的交通总长叶恭绰被迫去职。后来日本又提出抗议加威胁十余次,美国也不甘示弱,抱着他们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国在华应该商机均等,拒不承认日本的独占权。北洋政府进退维谷,交通部“质问纷来,几无宁日”。此案一直拖到北洋政府垮台,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个中美借款国际电台,并没有实际开工建设,最终不了了之。

(据《北京日报》)